



投身抗日救亡的激流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川大校园重又沸腾起来。全校师生联名率先在省内通电全国，声援北平学生，声讨汉奸卖国贼，进行零星、分散的抗日宣传活动。

不久，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派遣，共产党员韩天石等一批革命学生南下入川，转学我校，与学校进步学生王彦立、康乃尔、王怀安等结合起来，建立了以川大学生为骨干的民先队成都队部，走出校门，上街下乡，唤起民众，并派出进步学生掌握四川、成都和川大各级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抗敌后援会”、“抗敌宣传团”等的领导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此期间，师生还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办起了《前进》、《金箭》、《民先汇报》、《抗日先锋》、《战时学生旬刊》、《活路》、《救亡》、《图存》、《大声》、《星芒》等一大批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动员各阶层人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由川大党员学生主持的《大声》、《星芒》和《四川日报》副刊，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是抗战时期最著名的刊物之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四川、成都、川大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川大先后重建了党的支部、总支，经常活动的党员多达120余人，是当时国统区最大的基层党组织，先后向革命圣地延安输送了大批骨干。一部分党员如韩天石、康乃尔被推上中共川康特委有关负责人和成都市委书记的岗位，大批党员被派到省内担任中心县委、县委书记，重建各地党组织。如川大总支副书记、理学院学生邓贤明被派到重庆担任川东特委负责人，后来被选为白区党组织的代表，到延安光荣地出席了党的“七大”。



抗战时期川大党员学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许多人解放后都成为党和国家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人。

冲破黑暗 迎接黎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内战，掀起反共浊浪。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在国统区兴起。1944年以川大为主体的成都学生抗议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统治的“双十一”游行，是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兴起的标志，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这次斗争，认为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大爆发”。这场斗争拉开了全省学生配合解放战争，开辟“第二战场”的序幕。以后许多涉及全市、波及全川的重大斗争，如支援《华西晚报》、声援昆明“一二·一”运动、三教授事件、李实育事件，反对《中美商约》反对美军暴行、声援南京“五二〇”血案、保障人权运动、助学运动、尊师运动、“四九”运动等，川大进步师生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民协”、“火星社”、“民青”等革命组织团结全校进步师生，冲锋陷阵，起着主体和骨干作用。特别是1948年的“四九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成都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有全国影响的革命学生运动。它以清平价米为由，猛烈冲击着国民党政权在“大后方”的统治秩序，粉碎了他们退守四川，负隅顽抗的幻想，表现了川大师生大无畏的气概，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临解放前夕，经党组织安排，数以百计的川大学生，深入到省内50多个县市，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和策反，牵制敌人有生力量，为大西南的解放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这场冲破黑暗、迎接黎明的斗争中，川大师生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有的同志来不及看到解放，就倒在敌人的屠刀下。1946年“11.27”大屠杀中，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除著名



的江姐一江竹筠外，还有张国维、何懋金、李惠明（女）、马秀英（女）、郝跃青、蒋开萍、胡其恩、黄宁康等9人。12月7日大屠杀中牺牲在成都十二桥的杨伯恺（教授）、王干青、刘仲宣、张大成、余天觉、缪竞韩、田中美、方智炯、黎一上、王建昌等10人。此外还有在武装斗争和征粮剿匪中壮烈牺牲的徐达人、杨家寿、庹曾纹（女）等人。烈士们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染红了五星红旗，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胜利的源泉

对于川大师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革命前辈、老教育家张秀熟在《四川大学史稿》序言中，作了极为精辟的概括：“自辛亥起义至五四运动，汇为革命洪流。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校友王右木即建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党四川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自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战争，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无一年无革命斗争，川大校友无不站在斗争前列，监狱也成为战壕，“二一六”、渣滓洞、十二桥，至今黄土丰碑，犹有烈士鲜血的光芒，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川大学的革命斗争史。”

川大的革命传统是革命前辈用鲜血铸成的，也是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青年，成为今日四川大学的革命传家宝。这些传统，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

紧扣时代脉搏，为民族解放求索奋斗传统。民主革命时期，无论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大批有志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为拯救中华、为民族生存，为祖国自由独立，而站在时代前列，把自己命运与工农的命运、中华民族的



解放紧紧联在一起，不惜流血牺牲。这是最可宝贵的精神。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运动的传统。高等学校作为人才、知识密集的地方，师生们的思想是较为活跃的。革命前辈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接触各种主义、各种学说、各个思潮，经过比较、过滤、鉴别，摒弃错误的东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并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从而不仅使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而且自己也在斗争中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先驱，四川党、团组织的奠基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川大革命活动的实践充分证明，革命活动必须而且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川大师生半个世纪用鲜血换来的真理。新民主革命时期，我校每一次大的革命斗争，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的。川大校内不仅有总支、支部、小组，还有外围组织、进步学术团体，以党组织为核心形成强大的力量和貌似强大的敌人进行较量。1923年川大党团基层组织的建立，促成了大革命的高潮；1936年学校党组织的恢复，推动了抗日救亡激流的发展；1945年川大支部的重建，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形成了内外结合的波澜壮阔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党对革命活动的领导，不仅保证了革命活动的健康发展，也保证了党组织自身的组织发展壮大。

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注重社会实践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川大每一阶段的革命活动，最后都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一方面把文化运动、革命运动导向建立新中国的正确方向，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另一方面，使青年一代在向反动派作斗争的社会实践，向工农学习，在艰难复杂的斗争中，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得到了锻炼，扩大了见识，了解了国情，增长了才干，克服了自身的弱



点，最后成为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才。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来之不易的，是经历了无数代人的求索奋斗，用青春甚至鲜血换来的。我们不仅要敢于砸碎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应该继续保持、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革命先辈所创立的新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征稿：李荣松)

(选自《武侯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南京逃亡记

马识途^①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大举向华北进攻，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国群情激昂，要求政府抗战。接着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登陆，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企图灭亡中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全民抗战，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斗争终于爆发了。

在这以前，我正在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上学，本来一心想工业救国，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日本继东北而华北，不断占我国土，屠杀人民，北平学生群情激奋，正如他们说的，偌大中国连放一张课桌的地方也没有了，于是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立即波及全国，在南京的学生立即响应。我参加了运动，才知道民族不得解放，工业救国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于是积极参加救国活动。

“七七事变”后，我们一群男女大学生，马上组织了一个中大农村服务团，下到南京近郊的晓庄。我们的理想是去把那里的

^① 马识途，四川忠县人，1915年生，西南联大毕业，1936年参加革命，历任县委特委书记，解放后历任省委组织、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职。作家，曾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等职。出版《清江壮歌》等小说约十部。